

文苑縱橫談

1

文苑纵横谈

〔1〕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文苑纵横谈

〔1〕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57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书号 10099·1516 定价 0.60元

目 录

萧涤非与杜甫研究.....张忠纲(1)

从奥勃洛摩夫到阿 Q.....田仲济(18)

真实·传神·精练.....徐文斗 孔范今(30)

——略论鲁迅小说的人物语言

论鲁迅后期的审美观.....傅冰甲(46)

当前日本对鲁迅的研究.....〔日本〕山田敬三著
周坚夫 韩贞全译(63)

积极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肖洪(72)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任乎先(79)

谈人物关系的描写.....陈宝云(92)

要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赵连起(103)

欣赏和阅读.....刘光裕(108)

茅盾历史小说的创作特色.....朱德发 翟德耀(115)

天然去雕饰 清新意趣浓.....王殿基(129)

——看《喜盈门》漫笔

表现新时期农村新人的心灵美……………武 鹰(139)

——浅谈王润滋的短篇小说创作

试论李清照词的情、真、美……………蔡启伦(146)

张华文学刍论……………伍 丁(162)

《桃花扇》创作的启示……………国 庭 林 木(178)

深情与诗……………杨启璋(191)

——略谈潘岳等人的悼亡诗词

康德论美……………曾繁仁(197)

“美的本质”的初步思考……………夏 放(210)

萧涤非与杜甫研究

张 忠 纲

《杜甫研究》，是萧涤非教授研究杜甫的一部力作。它初版于五十年代。由于它的说理透辟，内容丰富，颇具特色，在学术界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誉为“是一部有创造性的作品”，能“以今日的科学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作出新的正确的评论。”而特别赞扬萧涤非教授做到了“烂熟杜诗于胸中，不但分析杜甫作品时，可以‘呼之即出’，即叙述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时，也处处‘有诗为证’，没有一句虚测或附会的话。”最近，为应读者所需，齐鲁书社即将再版《杜甫研究》。这次再版，经萧涤非教授作了修订，上卷为一般论述，下卷为建国以来作者所有关于杜甫研究论文的结集。可以说，这部著作连同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杜甫诗选注》，是萧涤非教授几十年研究杜甫的心血结晶。许多读者读《杜甫研究》，很想知道萧涤非教授“治杜”的经验和甘苦。可是萧涤非教授很谦虚，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确实，让萧先生谈自己的治学之道，是勉萧先生之难的。既然如此，我们便登门采访萧先生，并在他布满书籍的寓所里，开始了有关杜甫研究的谈话。

“我于古文学，特爱少陵诗”

萧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带歉意地说：“我的老师黄节先生有句诗：‘壮年怕题生日诗’。他为什么‘怕题’呢？大概是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题’的。这自然是老先生的谦词，实际上他是不愿题，不愿为人所知。他自号‘晦闻’，也正是这个意思。我是学我老师的，他尚且如此，所以我更是不愿提自己的事。几个刊物约我写什么自传，谈什么治学经验，我最怕这个，至今没有动笔，还欠着账，人家可能会有意见的。你们几次要访问我，坚持要我谈谈，实在推不掉，只好谈一谈。可是说真的，有什么好谈的呢？”先生开了话头，我们很高兴。想到先生曾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写道：“我于古文学，特爱少陵诗。”于是我们就说：“请先生谈谈您为何‘特爱少陵诗’？”

萧先生沉吟了一会儿，感情沉重地对我们讲起了一些辛酸的往事。先生的童年是悲苦的。他未满周岁就失去了母亲，十岁时又失去了父亲，是一个孤儿。他的童年是在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度过的，亲眼看到了农民的疾苦。儿时读《水浒》，印象最深的就是“智取生辰纲”中白日鼠白胜唱的那支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读《唐诗三百首》，背得最熟的不是那些五言绝句，而是杜甫的长诗《兵车行》。当时虽不知杜甫为何许人，但杜甫那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影 响。考取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后，他又读了杜甫的全集。当时黄节先生开了六门课，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诗经》和《汉魏乐府

风笺》。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历代风诗选》，从《诗经》一直选到清末黄遵宪，就是在这种影响下搞出来的。这实际上是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这番调查，使他看到在中国古典诗人中，反映民生疾苦的，要算杜甫最为突出。杜不仅作品多，而且感情最真挚，思想最深刻。^④但这时在感情上，他和杜甫还没有发生共鸣，对杜诗也还谈不上特别爱好。一九三〇年，萧先生大学毕业。但在旧中国，毕业就是失业，他找不到生活出路。因为他在清华时已是一个有名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当时曾有一位好心的同学要介绍他去河南当体操教员。他感到一个学中文的却去吃体育饭，不好意思，就谢绝了。适巧这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规定大学四年总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可以免试，每月有三十元的津贴，这样萧先生才进了清华研究院。他的指导教师即黄节先生。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后来出版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曾被黄节先生誉为论证“切实”、“确当”，不乏“特见”。黄节先生在论文审查报告的结尾写道：“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优等生，在他研究院毕业后，却依然面临着失业的威胁。最后，还是凭借黄节先生的力量，推荐他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因为当时山大中文系主任张怡荪先生也是黄先生的学生。

使萧先生真正爱上杜诗，并从感情上发生共鸣的，那是从抗战前后开始的。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个人经历，与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情形有点相似，“战伐乾坤破”，“天地日流血”，使他亲身尝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抗战前期，萧先生在四川大学任教，当时川大的校长是国民党 C、C 分子程天放，他手下的一

帮人胡作非为，大家都骂他们是“党棍子”，因萧先生是外乡人，于是程就先拿他开刀。他被解聘了。按照当时惯例，若解聘教员，必须于一个月前通知本人，而程却直到最后那天才通知萧先生，搞突然袭击，使人措手不及。萧先生对此异常气愤，但也没有办法。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幸亏他的老同学余冠英先生来函介绍他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当时联大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在昆明的五年（1941—1946），生活特别艰苦。昆明的生活水平，当时号称“世界屋脊”。萧先生虽身为教授，但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到其他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去兼课。有时还不免饿肚子，进当铺。而使萧先生特别伤心的，是他还亲身尝到了一种变相的鬻儿卖女之痛。当时萧先生已有两个男孩，但爱人又怀了孕，因为经济困窘，感到实难养活，经友人说合，遂决计出生后即送给别人。这是萧先生作为一个父亲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天深夜，他卧床仰屋，不禁悲从中来，便写了一首以《早断》为题的诗：“好去娇儿女，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故山林。”因爱人操劳过度，孕七月而早产，婴儿生下来三天就夭亡了。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杜甫的遭遇：“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萧先生的《早断》诗，经朱自清先生介绍，在潘伯鹰主编的《饮河》诗刊上发表后，有读者致函诗社，说诗写得“沉痛真挚，读之泪下。”可见感人之深。

当时不仅生活上异常艰苦，而且政治上也倍受压抑。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萧先生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所做的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他那时住在昆明附近呈贡县的一个村子里（卞之琳、沈从文也住在那里），就亲眼看到国民党拉伕，把人用绳子连成一串串的，以防逃跑；有的生了重病，人还没断气，就被

扔到后山上，乌鸦啄他时，手还在挥动，真是惨不忍睹。

最使萧先生悲愤填膺的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毒打和惨杀爱国师生，其中就有他的学生潘琰烈士。潘琰因为救护受伤同学而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国民党特务又凶残地在她胸部猛戳三刀，当天下午五时半，在云大医院的病榻上，潘琰喊着“同学们团结呀！”的口号与世长辞了。同时被害的共四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先生当时愤慨地写道：“‘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萧先生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写了《哭潘琰君》诗二首：

堂堂黉宇变屠官，血染青天白日红。

载籍应无前例在，先生谁不动于中？

休言辍讲争三日，剩欲归耕老一农。

世事也知无处说，低眉深觉负春风。

哭君无泪可沾巾，历乱三刀证此身。

人性于今惟有恶，天心自古不亲仁。

由来政治多污渎，凡在高明有逆鳞。

占得西南联大葬，英灵长共五华春。

诗被学生拿去发表在《妇女月刊》专号上，让一个国民党员同事发现了，向萧先生提出警告，说“血染青天白日红”是意在侮辱“党国”，不然为什么要这样写？你难道不知青天白日旗是党旗吗？萧先生回答他说：“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嘛，青天白日之下杀人，我并没有造谣。”讲到这里，萧先生深有所感地说：“是生活使我接近了杜甫，产生了研究杜甫的念头。在当时

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读杜甫的诗确是一种安慰。就象文天祥在狱中说的那样，你想说的，老杜已先代你说了，读他的诗，就象自己的诗一样，而忘其为老杜诗了。我总觉得，在我国文学史上，杜甫是欠劳动人民的血汗债最少，而又为劳动人民说话最多的诗人。因此对杨亿之流骂杜甫为‘村夫子’特别反感。宋人戴昺就曾不服气地说：‘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万丈长！’这驳斥得很痛快。杜甫是‘嫉恶信如仇’的，他说：‘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种爱憎分明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陈老总对这两句诗评价极高，说是‘最富现实意义，余以千古诗人、诗人千古赞之’。杜甫是可以当之无愧的。总之，我的生活实践和个人经历，使我逐步爱上了杜甫，爱上了杜诗，所以当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我又回到山东大学的第二年，便开了杜诗这门课。但这也只是一个开端。”

治学应取材宏博而取舍谨严

通过上面的谈话，我们了解到萧先生和黄节先生的密切关系，因而也很想知道萧先生在治杜诗的过程中，师承了黄先生的那些治学经验。当我们问起这方面的情况时，萧先生满怀深情地说：“我与黄节先生的确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一点不假，他是我的恩师。他治学的一个特点是取材宏博而又取舍谨严，这对我很有教育作用。他研究任何问题，都是首先尽可能地占有有关材料，如研究某个作家，就尽量把前人的有关著作都收集到。黄先生是一九三五年正月病逝的，由我和他的女婿清理遗书，其中有关《诗经》的书籍竟不下数百种之多，但他写的《诗旨纂辞》（未完成）却非常简要。他注解过曹子建、阮籍、鲍照、

谢灵运诸家的诗和汉魏乐府，对阮籍诗下的功夫尤深。他结合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毫不穿凿附会，对阮籍的一些看法和鲁迅先生是不谋而合的。黄先生在教学上也极为认真。记得他开过一门选修课，选这门课的只有两个人，有时一人请假，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听，但黄先生在讲台上照样讲，依然声如洪钟，以至隔壁教室都能听见。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确实感人。”说到这里，萧先生还给我们讲了一件小事，他说：平日我去看黄先生，他总是彬彬有礼，穿着长袍下楼接见我。但有一次，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去看他，他却破例让我上楼去。我一进门，只见他满头大汗，正在翻书，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曹子建诗里有个典故还没查到，明天有课，我要准备。我说，曹子建的诗你在北大、清华都讲过几遍了，一个典故查不到关系不大，明天照样可以讲嘛，何必还这样费力备课。他注视着我说，不行！上课前我总要备课，我得查出来。他这种认真态度对我后来的教学影响也是很大的。

我们从黄节先生的治学谈到治杜诗，萧先生谈了他的体会。他认为，杜诗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大”。这“大”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的广阔性，杜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绘画、舞蹈、书法、音乐等。一部杜诗，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所以向有“诗史”之称，由于他还写了许多纪行诗，所以宋人又有“少陵诗卷是图经”的说法。一是形式的多样性，各种诗体无所不包，古诗，近体诗，包括律、绝直到很少用的长篇排律，杜甫都写过，所以陈老总说：“吾读杜甫诗，喜其体裁备。”杜甫以诗代史，以诗寓褒贬，以诗写人物传记，写传奇，写奏议，以诗写赠序，写书札，写自传，写游

记，在杜甫手中，诗差不多成了万能的工具。所以前人说杜甫“无一事一意不可以入诗”，是符合实际的。杜诗的第二个特点是“真”。杜甫感情真挚，毫不装腔作势，他的诗都是在一种“不吐不快”的状况下写出来的。所以那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读来格外感人。关于真，萧先生援引了庄子的一段话：“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萧先生说这段话讲得很深刻。杜诗有真情实感，爱则真爱，恨则真恨，悲则真悲，乐则真乐，所以能动人。清人黄生说：“他人无所不假，杜公无所不真耳！人假，故其诗亦假；人真，故其诗亦真。”这话说得也有见地。

由杜诗的体大情深，我们提到在研究杜诗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博与专的关系。对此，萧先生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博与专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也有个先后次序问题。一般是先从专入手，然后由专而博，以专带博。所谓专，就是对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在深入的过程中，自然会发现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博。专要求博，专又推动博。研究杜诗，杜诗就是专的对象，要熟悉对象，要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深入研究。这样，博才不至于漫无边际，要专中求博，对象不熟，博则无从入手。杜诗号称“诗史”，号称“图经”，黄庭坚还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所以从宋以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既然如此，研究杜诗，不博怎么行呢？研究杜诗的一字一句都要专，而要解一字之疑，释一句之难，也非博观不可。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对剑器舞是不是舞剑，陈寅恪和任二北先生

都有详细的考证，而二人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萧先生查阅了许多记载乐舞的书籍和描写剑器舞的诗文，通过阅读唐人诗中有关剑的描写，发现唐人多以秋水、青蛇等比喻剑光，从而认为诗中“罢如江海凝清光”一句，也应当是以水色喻剑光的。由此而推知剑器舞必用剑，否则不可能有此境界。这个推断是合情合理的。从而对陈寅恪和任二北先生都引证过的《明皇杂录》中的那段话，萧先生也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因此，要作出一个判断，就必须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写起来是一条注，而实际工作却是很复杂、很艰苦的。这就需要博览，需要积累。所谓“取材宏博而取舍谨严”者，就是要广泛占有材料，将占有的材料加以比较，然后才能决定取舍，才能避免片面性。取材不宏博，仅仅根据一二条材料，谈得上什么取舍？所谓“博观约取”，也是这个意思。惟有“博观”，方能“约取”，惟有“博观”，取舍方能谨严。

“研究杜甫是一种乐趣”

萧涤非教授研究杜甫几十年，成绩卓著，是国内知名的杜甫研究专家。但当我们问他治杜诗的方法时，他却谦逊地说：“不敢说什么治杜诗的方法。如果谈得上研究杜诗的话，那还是解放后的事情。主要是在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特别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之后，才算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毛主席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精辟论述，就指导着我去着重研究杜甫接近人民生活的一面。解放初期，因为怕犯形式主义的错误，对作品往往只谈思想性，不谈或少谈艺术性，结果，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

准第一，变成政治标准唯一，艺术标准第二，无形中被取消了。我觉得这并不符合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因为毛主席分明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正是基于这种体会，我在《杜甫研究》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分析了杜诗的艺术性，并写了《杜诗的体裁》的专章。”接着，萧先生强调指出鲁迅先生说的如下一段话的重要性：“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萧先生认为这一段话，对文学研究者们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鲁迅先生现身说法的经验之谈。他自己就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杜甫研究的。鲁迅先生这段话，和我们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全面观点，辩证观点等，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说“说话要有根据”。没有根据就没有说服力，根据不足就缺乏说服力。但要做到说话有根据，也只有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行事。做学问切忌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更不应该只凭个人好恶而妄加抑扬。研究杜诗，不仅要懂得某字某句某篇，而且要了解杜甫的全人，了解杜甫所处的时代，不仅要翻阅杜甫的全集，而且要翻阅大量的有关历史资料。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博了。由全篇而及全人，而及所处的时代，不博怎么行呢？至于注解杜诗的具体方法，萧先生认为最好是“以杜解杜”。他很欣赏清人吴兴祚在《杜诗论文》序中说的两句话：“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认为这对我们今天注解杜诗还是适用的。尤其是在有关杜甫为人的某些问题的争论上，特别值得我们记取，以免犯“强杜以从我”的毛病。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二句，有的注家认为是杜甫自谓，如浦起龙；有的认为不是，如王嗣爽谓二句“骂庸

臣刺骨”，杨伦认为是“指琐琐事干谒者”；近来也有人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认为既不是指自私自利奔走干谒的人，也不是杜甫自指，而是杜甫的“自解和自嘲”。究竟哪种解释更切合杜诗原意呢？这就要结合全篇全人来理解。萧先生是从杨伦的说法的。因为“穷年忧黎元”是杜甫的中心思想，也是贯串全诗的骨干。因为“穷年忧黎元”，所以杜甫能够从“彤庭所分帛”而想到“本自寒女出”；能够从“朱门酒肉臭”联系到“路有冻死骨”；能够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以至“忧端齐终南，湔洞不可掇”。杜甫既然是“自比稷与契”的，怎么可能自比于“但自求其穴”的蝼蚁之辈呢？再就杜甫全人讲，也不可能。这是不必多说的了。不错，杜甫曾自比于“丧家狗”，但那是指由于经济困窘而出现的狼狈相，和人格无关，而“蝼蚁辈”则是贬斥人的话，是个思想问题，人格问题。很明显，《咏怀五百字》中的“蝼蚁辈”，就是指诗中的“同学翁”，居“廊庙”者流，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所说的“各有稻粱谋”的“随阳雁”正是一路货色。对《羌村三首》中的“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他认为也应该这样结合全篇和全人去理解。为这两句诗，萧先生已写过三篇文章，可说是“屡进屡得”，多所发明。由此也可看出先生治学态度的严谨和认真。

在谈话中，萧先生特别强调研究杜诗一定要细心，要用心，真正做到象杜甫那样“细论文”，那样“苦用心”。近人还没有全注杜诗的，一般选本选的杜诗是比较好理解的，而杜集中有些诗却是不好懂的，很难理解，这就要发扬“啃骨头”的精神，不要避难就易，要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萧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研究杜诗，偏是碰到比较难解或说法不一致的地方，他偏是

不肯放过，总是开动脑筋，尽可能提出个人的看法，如关于杜甫是不是人民诗人，杜甫的忠君思想，杜甫之死，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确为杜甫绝笔等一系列问题。他说，要理解杜诗，首先就要熟读杜诗，前人说的“读百遍，义自见”，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也离不开深思。所以前人又有“思之思之，鬼将告之”的说法。不下一番苦功夫，要真正理解杜诗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我们请萧先生谈谈他几十年来治杜诗的甘苦，想不到萧先生微笑着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研究杜甫是一种乐趣。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如王嗣奭、仇兆鳌等就都是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于杜诗的。王嗣奭说他二十岁读《新安吏》，到八十岁还在读，一天夜里忽于枕上得一新解，即视为莫大的快事。他在诗中也说“忆昔攻诗梦少陵”，可见其用力之勤，用功之深。我个人也有这么一点体会。常常是因为思考杜诗中的某个问题而寝食不安，如偶有所得，就是半夜三更也要起来把它记录下来。一些诗句确是在读过若干遍之后才懂得的。比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的“玉貌锦衣，况余白首”这两句，前人读不懂，有的说上下文不接气，有的还要改动原文。我开始也读不懂，经过反复阅读，仔细玩味，我渐渐懂了，认为这是杜甫“以诗为文”，“玉貌锦衣”是指当年的公孙大娘，但这个主语被他省略了，“况余白首”则是指现在的作者自己。两句是说那时我尚童稚，而公孙大娘已是一个妙龄女郎，现在连我都白了头，公孙大娘就更不用提了。省去公孙大娘这个主语，文句更紧凑，对比更鲜明，更富有诗味，充满今昔之感，寄寓无限感慨。这样